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天人合一”之境

孙全胜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随着科技的广泛应用,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突出,已经吸引了更多学者的目光。工具理性引起的全球的生态危机和消费主义引发的人的片面短视,已经吸引学者把研究焦点对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很早之前人类就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早在二千多年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就发出了“天人合一”的倡议;而在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年代不同,但是,它们有着一定的交融之点和内在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之境,对创建美丽中国和构建和谐生态系统是有实际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天人合一;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16)01-0092-06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度逐渐增大,这既为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又为人类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扩大的生产实践让人类意识到自然并非是人类的附庸,而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共同体。因此,人类更加重视生产实践对环境的影响,更加谨慎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需要抛弃陈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超越了现有的生态伦理范式,将伦理关怀推广到自然和其他生物,将公平正义、权利义务拓展到自然系统,倡导既要对人讲生态伦理、也要对自然和其他生物讲生态伦理。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以及内蕴的“天人合一”之境,对我们树立新型的生态伦理观有一定启发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坚持自然的先导地位,认为人来源于自然、服从于自然,但他又认为人对自然不是被动的服从,人可以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自然。劳动

是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环节,让人类历史得以产生和发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31}人类历史就是人将自然改造为适合人类生存状态的历史。自然一直在演变,人对自然的认识在逐渐加深,人对自然的改造在不断强化。人类历史就是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历史。人类凭借劳动将自然的一部分变成社会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128}他认为,具有自然本能的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无法脱离自然的生态环节的一部分。“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124}。恩格斯也指出,人来源于自然,是自然的构成要素。“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383}人类的一切物质存在都是自然的,都属于自然的构成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3]383}因此,人终究是自然发展

收稿日期:2015-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2BZX078)。

作者简介:孙全胜,男,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到一定阶段才诞生的。自然实践活动是人能动力量的体现,体现着人的认识能力、对自然的义务和担当。

人必须接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以自然为存在和发展条件。自然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源泉和动力。人类要生存,必须依赖自然,尊重自然,给自然以伦理关怀。有人才会有历史,而人的生存和发展始终离不开实践,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也就是说,良性的自然系统是人实现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自然既是感性的本体,具有实际的形态,又是形式的本体,具有抽象结构和体系、规律,还是理念的本体,具有存在的永恒性,是内在和超越性的。自然既是本性的存在,具有内在规律和因果联系,是能够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又是神学性的存在,充当上帝的作用,内部有着等级秩序。造物主存在于自然并与自然同一。宇宙资源是无限的,但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不能肆意利用地球资源。其一,自然为人类直接提供了大量生存必需品,如阳光、水源、空气、矿产等,离开这些自然资源,人类是一天也无法生存下去的。工业革命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让人口大量而持续的增长。可地球资源有限,给自然系统带来了沉重压力。为了人类生存,要维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保持自然生态平衡。人类必须小心的呵护自然生态系统。其二,人类自己制造的生活资料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来自自然的。人类太脆弱,承受不了环境的巨大改变。环境的改变对人和其他生物影响是巨大的。人类要继续进步,既要靠先进的科技,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或让人类找到比地球更好的生存场所,又要在找不到更好生存条件下,尽力维护好地球这个家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保护地球生态系统。

工业生产损害着自然生态。资本主义霸权、生态危机、社会矛盾推动着人们重新审视生产实践。人控制自然的弊端显示了科技的局限。单凭科技不能让人类获得全面发展,只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异化。科技已经成为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工具,必须批判工具理性、科技的消极后果、国家资本的垄断。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有意识,比动物高明。人能改造自然,动物却只

适应。“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才产生出来的。”^{[5]87}

人类凭借科技对自然进行着巨大改造,人时常滥用自己的力量,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受倒伦理制约,人必须对自然承担伦理责任。人需要把伦理关怀由人与人、人与社会拓展到人与自然。人要把自然生态伦理关系纳入道德研究。生态伦理倡导自然和人道的结合,主张人的实践行为遵循伦理规范。首先,人类要对自然友善,肯定自然的价值和权利。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属性和价值,离开人,自然照样存在和发展。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存在权利。人没有权利征服和统治自然,只能尊重自然。自然有自由发展的权利,人必须尊重自然,清除人对自然的支配性的思维和行为。人与自然不应是征服与被征服、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而应是平等、和谐的关系。再次,人类要节制消费欲望。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失衡。自然资源被人类无节制的开发,人类将自然当作工具,变成生产和消费的对象。最后,人类在利用自然时要加强联合和监督。人与人的阶级对立和利益分配不均,加剧了与人自然的冲突。而人对自然的破坏加剧了人与人的仇恨和对立。但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必须先获得生存的条件,才能考虑自然生态平衡。“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5]57}因此,要依照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开发,以实现生产实践的生态伦理化。

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建立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需要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纳入社会进步的总体评价标准和考核体制。我们需要完善土地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制度,要完善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实行生态补偿措施,变革自然生态保护管理措施。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必须谨慎的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控制在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不要破坏自然本身的新陈代谢速度和频率,真正意识到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的紧密关系。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并不显著,人类只有先顺服自然,才能接受自然的馈赠。只有顺服自然的人,才能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是对技术理性的拒斥。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力图突破传统语境、突破传统的主客对立、自然与伦理二分格局来探索自然生

态、生活方式、生存意义等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限制人对自然的盲目开发和利用,就要引导人们更好的看待信仰、技术、知识、理性和价值,引导人们争取自由和变革。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满足主体的人的合理欲求,但满足主体的人的欲求必须以尊重外在自然为前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指示作用。人类的生产实践没有超出地球资源所能承受的阈值时,地球生态系统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调节作用,达到原本的和谐稳定状态;如果人类的生产实践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就会引起自然对人类的巨大发作用,甚至以各种方式毁灭人类。如同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了。”^{[3]383}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一些伟大文明正是由于环境的巨变才毁灭的。只有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人的生产实践有所限制,才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维持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

二、儒家“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后来被汉代儒家董仲舒发展为系统的哲学体系,指的是“人道”要符合“天道”,才能政治亨通、国泰民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认为,自然界中的天地人是一个普遍和谐的共同体,人是这一和谐共同体的一部分,人应该把对自然的态度纳入到天地层次的道德领域,人应该遵循天地之道,丝毫不能违背天意,而要在自然法则的指导下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人作为主体能动力量,必须考虑自然法则的普遍指导意义。人不能控制自然,而要与自然协同进步。“天人合一”伦理强调人的幸福要遵守自然道德法则,欲望要接受天道伦理制约。幸福就是要符合天德。获得幸福首先要有德性行为,而这种德性行为是天道的体现。人的幸福不能损害自然利益,不是人的本能实现、放纵感官快感,而是节制欲望、符合天道。人的幸福既是实践获得的,又是天道赐予的。人要勇敢、牺牲、毅力,要德性而智慧。本能是善良的阻碍,必须节制。这种敬天畏地的思想是儒家生态自然观的根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基本境界。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是要求人道和天道相互融合,而是要求人道符合天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人道是无法与天道相提并论的,天道始终

居于主导地位,人道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天道。一切要看天意,一切要听天意。《周易》的阴阳八卦思想就是先哲在观察天地万物后总结出来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中也提倡“与天地合其德”,也就是说,君子之德必须要合于天地之德。“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周易》的这种“与天地合其德”思想尽管朴素简单,只是人的经验总结,但也提醒人们要尊重自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政者的滥杀苛政行为。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进一步深化了《周易》的“与天地合其德”思想,较系统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他坚持人道要顺服天道,天道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命运,人必须懂得天道、敬畏命运,倡导人们要遵循天地之道为人处世。人首先要了解天道、敬畏天道,进而对天地万物充满敬爱,不断的通过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来弘扬天道。生死有命,不能强求,人能够弘扬天道,天道却不是因人而存在。孔子认为,天道中很重要是“仁”,因此,人也要做到“仁者,爱人”。君子不仅要用“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还要用“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和万事万物,由此来协调世界上的各类关系。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幸福,幸福不是满足欲望,而是遵循天道的德性行为。幸福是内心快乐、言行德性和心智善良。金钱、权力、地位都是一时的,爱和善良才是永恒。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会随着时空的转移而发生关系的变化,或近或远,或爱或恨,人与自然也是如此。

孟子将孔子的“仁爱”发展为“四心”,并认为人人都有这“四心”。他倡导人道要通于天道,人性要符合天性。人和动物的区别也是因为有了这“四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是说,人并不比动物强多少,只是因为有了“四心”,才把人的高贵之处体现出来了。孟子号召统治者要有“仁爱”之心,并要将仁爱之心贯彻到政策方针中,让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仁爱,让天地万物感受到人的慈爱。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君主作为人间的统治者,是天道的代表,一定要“仁民而爱物”,才能保证政通人和。除了君主应该实行仁政,君子也要担负道义,修行仁爱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可见,孟子的“仁爱”伦理不仅是人的道德意识在人际关系中的呈现,也是人的行

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合理性的论证和拷问。达成“仁爱”之心的关键是切实有效的伦理行为和伦理觉悟,就是要使自然与伦理、权利和义务和谐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并建构合理的生态伦理实践和行为。除了君主和君子要遵循天道,实施“仁爱”之心,农民的耕种也要遵循天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明确要求遵循节气时令,反对乱砍乱伐、违背农时。

荀子更加强调了天道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天道是实际存在的规律,不会因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虽然天道规律是客观的,但人也可以发挥能动性,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些天道规律为人服务。因此荀子又认为天道和人道是可分的,合理利用天道规律为人造福就是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指出,“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也就是说,君主要根据天时地利,按照天道规律和四时节气变化来组织本国的作物耕种,注意养护树木,让治下的民众能有多余的粮食和柴草。但是儒家伦理普遍坚持只有君子才有权利成为其自然实践的主体。虽然也提倡过“人人皆可以成尧舜”,但没有形成社会普遍共识。甚至,还将一部分民众看做“贱民”。儒家伦理对普通民众更多的是限制他们的“肆意妄为”,将之看作需要教化的,而不是应当舍身救助的。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普遍贫困的古代只能是少数人的幻想。汉代的董仲舒更将君主神化为上天的儿子,对百姓进行恐吓胁迫,让封建君主统治更加稳固。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经验认识,表现了古代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反映了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无所适从的境遇。虽然这种思想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肆意妄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肯定天道的先导地位,认为人道必须遵循天道,又肯定人道和天道有紧密联系,人可以利用天道造福自己。因此,儒家“天人合一”中的天人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而是有着明显的等级秩序:天道始终支配、控制着人道,人道始终只能遵循人道。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封建等级意识,更多关注的是作为最高统治的具有神性的天和道德来源的天,而较

少关注作为客观物质存在的自然界和宇宙,而且它的提出更多的是为了论证封建君主等级制度的正当性,而不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创造了很多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这些文明灿烂无比,代表了人类智慧,至今仍令人惊叹。可它们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创造了灿烂文明,也通过毁灭生态平衡让文明毁灭。科技让人类由愚昧、混乱的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理性的社会秩序,让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文明的更替既能够促进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居住方式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带来更多失范和迷茫。惨痛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要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们必须按照生态伦理方式改造自然,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虽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但其尊重自然的态度仍对当代人的自然实践具有启示。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天人合一”之境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都肯定自然对于人的先导地位,都坚持自然和人道的结合,都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虽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比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年代要晚得多,但它们还是有诸多契合之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蕴含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一)它们都主张人要服从自然及客观规律

马克思坚持物质对于意识的先导地位,并用这种思路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宏观的世界中,人仍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但不能离开自然,反而要尊重自然。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就处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之中。自然生物循环系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自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自然界没有人类想象的那么脆弱,但也不是无坚不摧。人类必须切实关注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利益,全面理解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要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内,要合理解决有限性资源和无限性发展的矛盾,实现自己的长远发展。自然不但满足了人的利益,而且维护着其他生物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确立自然具有价值,就会承

认自然也有权利。自然具有权利,也是由于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自然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也必须享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自然及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人类要尊重其他存在物的生存权利。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主张人的活动要符合普遍的天道价值,不存人的偏见,真实合理。天道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人可以认识天道,并在天道的基础上创造幸福生活。天道产生万事万物,人和一切事物都受天道的支配。人不能凭情绪行为,必须接受天道伦理制约,必须接受自然律法,成为行为高尚的君子。人的生命、生活、身体都离不开自然。人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自然。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本身。这种思想与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的某些论点是有相通之处的。

(二)它们都倡导自然与人道的结合

马克思坚持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强调自然对人的基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能对自然具有反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能够统一起来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4]人类的整个历史及其生产实践都可以纳入自然界。人类社会终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只不过是改造过的自然。当然,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深化,整个自然都可以纳入人的生产实践范围之内。人类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将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确证了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让自然处处留下人的痕迹,这是人道在自然的表现。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人在整个自然界中不一定居于主体地位。人的目的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这时人就要放弃目的、遵循自然规律。工业呈现着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成了人本质力量的展示。马克思倡导人道主义,论证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能动地位,意味着人的生产实践的飞速发展。在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主义发生了激烈争论。它们各自提出了很多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的价值,忽视自然利益,不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中心主义倡导自然价值,而无视保持生态平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而不是争论人或生态谁是中心。自然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结合,正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路径。当代生态伦理关注人与自然的物质

能量交换,彰显人为了长远发展而节制自己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要求人遵循天道,又要求人在天道的基础上发挥人的道德主体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倡导过“知其不可而为之”,荀子也倡议“制天命而用之”,他们并不是一味要求人遵循天命,也倡导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合理利用天道。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倡导人道与天道的结合,也倡议发挥人的主体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是有契合共融之处。

(三)它们都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并非仅仅来自对现实的批判,也来自对传统和历史的审视。每个社会阶段的自然都是系统的体系,自然要素会改变,但作为总体的自然系统不会瓦解。自然空间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载体,是资本增殖的场所。自然不会生产,而只能创造,只有人才能生产。但人的生产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无机的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5]33}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绝对霸权、单一模式,又要积极建构多元、真实的人与自然相处模式。人探求自然规律的动机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人探求自然规律的价值目标是更好为人类牟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在人的自然实践活动中形成。人对自然进行伦理关怀,彰显着人的伦理品性。“天人合一”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倡导自然价值、自然权利和一切生命。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以自然为中心,更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达成人与自然的平衡,是为了促进人的长远发展,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存在和发展才具有伦理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和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在争论人类还是自然谁是中心,而是要实现两者的平衡。

四、结语

现代性宣扬人的独立自主,主张人走出愚昧和顺从,成为自然和自己的主人。工业文明伴随启蒙运动而来,启蒙就是用理性认识和改造自然。理性既可以战胜迷信和专制,又能控制自然,虽然推动了社会 and 科技进步,奠定了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但是也破坏了人的伦理价值,让人的社会实践行为脱离伦理制约。“人在自然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

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6]36} 工业文明凭借先进的技术建立起对自然的政府和统治,让人们习惯于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实践模式,自觉认同自然与伦理的二元分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6]201} 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思考生态伦理问题。生态危机并非全是因为工具理性和经济利益,也是由于人的伦理标准、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就是在人类遇到工业文明挑战生态环境的背景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兴起,既是因为人类必须应对环境问题,更好的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又是由于人们意识到道德观念必须转变,打破道德范畴形式和目的分离、自然与伦理的二分,以通达真实的生活。人们在时代的困境中认识到,必须发掘清醒而纯粹的力量,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以正确认识人类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命运。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既坚持自然的基础地位,又坚持人对自然的能动反作用,并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在自然生物圈中处于何种地位,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对自然界的义务和责任。”^[7] 人并非自然的主人,人没有丝毫权力征服自然,而要感恩自然的赐予,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凭借科技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举动已经造成了生态危机,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自然和人的疏离关系,反思工业文明背后的现代性精神和二元思维模式,建构伦理与自然的亲密联系。生态伦理就是用和谐伦理关系建构人与自然关联,消解工业文明带来的控制自然的生产模式及理性道德深化,反思现代文明对自然的远离,检讨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建构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态自然观带来的道德观念转变启示我们,不仅要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体系,而且要用高效的实践推动伦理法则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当中。人类凭借科技创造了可观的物质财富,但也破坏

了自然生态和其他生物利益。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当地球因为人的过度开发而变得满目疮痍的时候,人类的生存也遇到严重威胁。人类不可能放弃工业化和城市化,退回到原始社会的狩猎和捕鱼时期,人类也会继续凭借先进的科技向自然进发。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当然对自然影响较小,原始的生活方式也能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但人不能回到原始的落后生产方式,只会继续前进。在理解和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时,我们既要进一步扩大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又要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克制,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8] 人们应该以天人相合的观点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节制自己的欲望,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更加融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规范和准则论证了可持续发展蕴涵的“善”,让我们能够对可持续发展做伦理分析和伦理评价,为人类的自然行为提供伦理坐标,以保证人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4.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 解保军. 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2:45.
- [8]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4.

(责任编辑:杜红琴)